

中共辽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办公室

汪金祥回忆录

(一)

归档时的案卷号：

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卷内共

份

张

保管期限

卷 内 目 录

顺序号	成文机关 (或作者)	文 件 标 题	文件 字号	文件 日期	文件所 在张号	备 考
	汪金祥	在东北公安保卫战线上(第二卷)		1981 12月	/	
		(九) 两次除奸保卫工作会议				
		(十) 收复沈阳前夕				
		第六章				
		(一) 风扫残云				
		(二) 一撮美谍的末日				
		(三) 大张镇反旗鼓				
		(四) 长白山风雷				
		(五) 海外“游鱼”投网				
		(六) “引蛇出洞”				
		(七) 捣毁金道门妖窟				

九 两次除奸保卫工作会议

我们在哈尔滨站稳脚跟之后于一九四七年一月和一九四八年二月，相继召开了东北全区的除奸保卫工作会议。这两次会议，根据党中央和东北局的指示精神，在分析敌情、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着重提出和阐明了对敌斗争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进一步做了斗争部署，使除奸保卫工作全面地走上向纵深发展的新阶段。

在一九四七年一月的除奸保卫工作会议上，我代表东北局社会部，做了“关于东北反奸斗争情况与当前任务”的报告。

报告指出：一年多来，除奸保卫工作虽然取得了很大胜利，在支援前方和巩固后方上，起了一定作用。但绝不能过高地估计成绩，产生轻敌自满情绪，以为把比较暴露的党特组织搞掉就万事大吉了。我们东北解放区建立不久，群众刚刚发动，侦察工作还未系统建立，各方面漏洞很多，任务仍然是十分繁重艰巨的。目前，敌人正在改变斗争的策略和方式，他们将破坏重点指向城市，并由公开转向秘密，由暴露转向隐蔽，而且改变得更阴险、更巧妙，因而也更不易破获了。我们的一切部署，都必须从这个实际情况出发。

会上重申东北局既定的重点保卫原则，对城市和农村、铁路和工矿、机关和学校，都分别提出了任务和措施。要求各地社会部和公安机关必须积极地健全各级除奸保卫机构，培养训练地方青年干部，围绕和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剷除各种反革命组织，打击敌人的

破坏活动，为保卫和发展解放区，为支援前线军事斗争，为东北全境的解放，而付出自己的努力。

为了实现这个任务，会上提出：在党的统一领导下，依靠群众打击敌人，是我们除奸保卫工作的基本路线。本着这条路线，各地必须采取一门工作、群众路线、行政管理相结合的方针；实行镇压与宽大打击与分化、教育与争取相结合的政策；建立请示报告、情报联系、统计表报等制度。各项工作都要向正规化方向发展，迅速扭转进入东北初期那种纷乱的、不正规的、各行其是的局面。

陈龙同志在会上做了“关于加强侦察工作问题”的报告。之所以突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当时许多地方指导思想不统一，做法不一致，行动不协调，以致往往打不中敌人，反而造成自己的被动。

会上，陈龙同志代表东北局社会部正式提出：“长期内线侦察是我们侦察工作的主要方针，只有坚持这个方针，才能深入敌人心脏，找到敌人主力，掌握敌人组织，在条件成熟时，达到及时破案、一网打尽的目的。提出：侦察工作的基本方法是调查研究，是专门的秘密侦察和公开的一般调查相结合的调查研究。技术侦察也是一种调查研究，也要积极地开展，但必须与其它手段紧密配合，不要搞单纯技术观点和神秘化的一套。接着又对侦察工作各个方面、各个环节的相互关系和任务要求，分别做了说明和解释。从而，统一了思想，在东北首次确立了侦察工作的正确方针。

陈龙同志严正指出：“长期内线侦察绝不等于‘反侦察’，绝不

能误解为可以任意采用以反动面目和反动行动出现的“反侦察”手段。“反侦察”方针，是不符合党的原则立场的错误方针，必须严格禁止。如确有必要做为手段使用时，也必须具有确定为反革命组织，有一定的对象和范围等条件，并经地委以上社会部批准，才看有限度地使用。以免自造敌人，引起混乱，犯扩大化的错误。

实践证明，这次会议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措施都是正确的。会后一年多，在打击敌人和建设自己方面，都取得很大成绩，局面迅速走向稳定，与我们入城之初已经大不相同了。但是，由于这次会议对某些问题解释得不够明白肯定，各地理解不一，工作发展很不平衡；加之，实践中又提出许多新问题，需要进一步加以研究解决。因而隔了一年，我们又召开了东北全区的除奸保卫工作会议。我和陈龙同志分别就全区斗争和侦察工作问题，向大会做了报告和总结。

那时，对于保卫重点放在城市，有些地方产生了怀疑情绪。由于他们只搞城市，扔开了广大农村，有的本无重要县城，又无铁路工矿，仍然机械地把重点放在一般城镇，因而搞不着特务，就认为“重点方针错了，该转一转了”。

我在报告中着重说明：保卫重点是根据敌人的锋芒所向和双方的力量关系而决定采取的。“我们在对敌斗争中所要打击的主要对象是隐蔽的敌人。这种敌人在哪里？主要的在城市点线，而不在农村”。因为城市有铁路，有机关，有工矿企业，是我们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又加情况复杂，便于隐蔽活动；因而敌人的破坏锋

主要是指向这里。“敌人在那里，我们的战场和重点就摆在那里”。在我们力量还很不足的情况下尤其不能分兵把口，四面照顾，而应紧紧抓住自己的保卫重点。不这样做，就不能集中力量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就叫做“不懂得保卫自己的要害，没有保卫工作的战略思想”。

当然，也要结合党的中心^{运动}，用一定力量积极抓好农村。特别是那些尚无大中城市和铁路工矿的地区，更应把主要力量放在农村。就是在农村也应抓重点，要首先将铁路沿线的、情况复杂和土改夹生的农村搞好，而不要平均使用力量，十个指头抓跳蚤。

至于抓重点，是以保卫我区为主，还是以向敌区派遣为主？当然要以保卫我区为主，也要积极结合省市以上除奸保卫机关适当的向外派遣。而向外派遣也不是为了别的，还是为了巩固、扩大和发展我们的解放区。

总之，重点保卫是点面结合的方针。不是片面性的方针。各地应当从实际情况出发，确定自己的重点，不能死搬硬套，搞脱离实际的模式化。

在贯彻路线、方针上，那时不少地方有片面化现象。他们或者只抓侦察，放松了群众工作和行政管理；或者只抓群众工作和行政管理，又放松了侦察。有的地方甚至提出取消侦察工作的论调，说“群众已经发动百分之八十，侦察工作可以不要了”。不

要侦察工作怎么办？就以“坦白抢救运动”来代替，企图以这种方法搞出一切特务来。结果，处处坦白，人人坦白，轰、追、逼、打、抓风行，并由外部牵扯到内部，由党外牵扯到党内，形成了严重的扩大化现象。

我在报告中严肃指出：这种做法是极端错误和极端危险的。隐蔽斗争是长期的不是短期的，是复杂的不是简单的。因而不应用简单的方式处理复杂的问题”。这种现象虽然还未形成普遍存在，但不加制止而任凭它发展下去，势必重蹈历史错误的危险。

历史的错误是什么？“是内战时期轰轰烈烈的查田、查阶级与左倾肃反混在一起，使一些人无辜牺牲；是抗战时期山东“湖西事变”的错误，盲目的逼供信，把几百人都打成托派；是延安时期的“抢救运动”，使许多同志错戴了特务帽子，背上了思想包袱。”幸亏毛主席及时制定和发布九条方针，才使我们避免了更严重的错误。我们搞对敌斗争的人，尤其要深深记住这些历史教训，任何时候都不要再蹈故辙。

会议要求这些地方必须紧急刹车，其它地方也要引以为戒。必须巩固地树立起长期内线侦察的思想，把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行政管理密切结合起来。不论什么地方，都要将教育、发动、组织、依靠群众提上重要日程；不论那个城市，都要清理户口，整顿交通，将旅馆、印刷、刻字、电料行、公共娱乐场所等特殊行

落管理起来。这是我们管好城市和强化侦察工作的基础。一定要“群好群季”，克服单打一的偏向。

行政策上的紊乱，也是那时一个很值得注意的问题。有些地方，对敌人不分大小主次，大批逮捕，甚至主张一杀了事，企图这种办法一举肃清特务。有的地方，受抗日初期统战政策的束缚，准许国民党组织合法存在，优待俘获过来的蒋特警宪骨干，甚至把处理党内问题的办法，搬到处理反革命问题上去。这种过左过右的现象，严重地背离和违反了党的政策，似乎镇压就是杀头，宽大就是释放，别的办法就没有了。

我在报告中指出这两种倾向都是错误的。要正确执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必须善于抓住区别对待这个关键，镇压少数，改造多数，不要搞一律化和极端化。要将打击锋芒紧紧对准既定的打击目标，对于应该打击的特务反革命，我们绝不容情。至于敌人在占领期间，以“撒灰政策”发展的一般反动党团人员，以行政命令建立的群众性情报网员，以及在国民党公开机关任职的普通行政人员，许多是被欺骗胁迫或为了生活出路而参加的青年知识分子和一般技职人员。对于这些人，除个别罪恶严重的须依法惩办以外，一般都应本着宽大精神，号召坦白登记，组织揭发控诉，予以政治感化和思想教育；有技术专长的，还要着意妥善安排使用，以使他们同国民党划清界限，逐步从思想上转到人民这边来。

会议严肃批评：刑讯犯人，搞逼供信是犯法行为，必须严格禁止。如有再犯者，一定严加追究，执行纪律。今后凡速扑处理反革命犯，必须报省委社会部审核批准；大的、涉及人多的和牵涉到我党干部的案犯，必须报东北局社会部审核批准。绝对禁止自由行动，以保证政策的正确执行。

陈龙同志在会上着重就长期内线侦察方针和侦察工作建设问题，做了进一步的说明和解释。

他在报告中指出：“一年多的实践证明，长期内线侦察，是我们彻底消灭敌人，取得隐蔽斗争主动权的正确方针。”它包括思想指导和工作指导两个方面。“所谓思想指导，就是要树立长期打算、建设自己、消灭敌人这样一个主导思想；所谓工作指导，就是要抓住内线侦察、掌握敌人组织，随时破案这样三个基本环节。这一方针，要求我们既要长期打算，掌握敌人组织；又要掌握时机，一举全歼敌人，这是执行这个方针的主要关键。”目前有些地方采取的见头就抓的作法，以速扑、审讯代替侦察的作法，玩弄长期内线、养奸以待的作法，都是背离这个方针要求的，必须迅速加以改正。

报告指出：积极贯彻长期内线侦察方针，必须从长期建设着手。长期建设的内容，是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业务建设。没有这个建设，就没有发现敌人的前提手段和物质基础，也就无从实行内线侦察以至破案歼敌了。

我们目前的敌人，不仅有国内的而且有国外的间谍特务。他们同我们斗争的方法，不是二年前的简单手段，而是使用日益巧妙的现代科学技术了。重新教育干部是当前一大课题。必须推动他们从思想上实行一个由农村到城市，由分散到集中的转变，努力学习城市各种社会知识，学习现代化科学技术，学习新的斗争方法和斗争策略。不这样武装干部的思想，侦察工作就不能冲破旧圈子，不能适应新形势，而取得隐蔽斗争的主动权也就成为一句空话了。

奠定侦察工作的组织基础，是刻不容缓的任务。首先要认真建立一支忠于革命、专于业务的侦察干部队伍。除这支基本核心力量而外，还要积极依靠各种有组织的群众，依靠广泛的社会力量，并把他们组织到对敌斗争战线上来。同时要善于使用敌人的力量，实行“以毒攻毒”。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强大雄厚的侦察阵容，以对付日益狡猾诡密的隐蔽敌人。

调查研究是侦察工作的灵魂，是业务建设的根本。在经常调查了解社会动向、阶级关系、群众思想的基础上，要着重调查掌握敌人的组织状况、活动的方式方法、变化的规律特点等等，使我们做到耳聪目灵，行动起来有的放矢。为此，要加强内勤建设、技术建设，加强治安管理，这些都是目前工作的薄弱环节，各地务须抓紧抓好，搞出一个与任务相适应的规模来。

会议认为，为了正确贯彻对敌斗争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积

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必须首先整顿和建设除奸保卫队伍。这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所在。

我们的队伍基本上是好的，但入城以后也出现了一些相当严重的不良现象。清洗旧警察当然还要予以注意，但当前主要是需要整顿我们自己干部的立场观点和思想作风了。据我们了解，干部中丧失立场，包庇坏人，贪污受贿，乱搞女人，作官当老爷，搞官僚主义，闹独立性，追求个人名利地位等问题相当突出，个别地方已经滥得不成其为“革命的宝剑”了。

会议决定，必须结合全党的整党运动，进一步整顿各级公安机关。在步骤上，要先整上级后整下级，先整老的后整新的，先整党内后整党外。老干部主要是查思想，查立场，查作风；新干部还要结合审查历史。整顿好坏的关键，在于老干部能否主动带头，起模范作用。老的整好了，新的也就带好了。整顿的方法，要强调在学习文件的基础上，开展和风细雨式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搞急风暴雨，不用大帽子压人。要严格控制处理面。除混进来的坏人和不可救药的分子需要处理以外，对于绝大多数同志都要采取再教育的方针。必须明确“整顿的核心是建设”，主要目的在于教育干部认识新形势、新要求，改进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提高整个队伍的战斗力，而不是大批大斗，大洗大刷，搞什么“打倒”运动。

当时，北满已是经过土改的联成一体的整片解放区。中满、南满的铁路沿线城市，虽暂时为蒋军占领着，但两厢农村基本上在我掌握

之中。而且随着战局的胜利进展，我们新收复的中小城市越来越多，形势已经向我们提出了既要巩固老区又要接收新区的更加繁重艰巨的对敌斗争任务。会议及时提出新区工作问题，从各方面积极做了部署，要求各地迅速做好干部准备和工作准备，以便迎接新的战斗。

与会代表们，在胜利形势的鼓舞下，在会议精神的指导下，都信心百倍地奔回各地，马上行动起来。我们相信，一个更加波澜壮阔的伟大斗争场面，即将展现在人们面前。解放全东北的日子为时不远了！

十 收复沈阳前夕

时光在战斗中过得真快，转眼迎来一九四八年，又是一个花红柳绿、到处生机盎然的春天。

这一年，是东北人民解放战争取得全部胜利的一年。从春初开始，我军在解放吉林、四平等重要城市之后，就将剩余的蒋军主力分割困锁在锦州、沈阳、长春三个孤立地区。九月十二日，辽沈战役炮声一响，锦州、长春相继迅速解放。最后只剩下一个丢头断尾的沈阳，活象一叶海上孤舟，在惊涛骇浪中飘摇欲没了。为了挽救败局，蒋介石急急忙忙飞到沈阳，亲自给敌军打气提神，接着又坐镇北平指挥驱策。但是大局已定他们全部滚出东北的日子已经来到了。

辽沈战役前夕，东北人民解放军政治部主任周桓同志，找我商量如何利用东北局社会部在敌区的情报力量，配合辽沈前线作战的问题。他说，最好利用一部逆用电台，向蒋军发出假情报，借以扰乱他们的军事部署。这当然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我立即认真地考虑了他的要求。

恰好这年春初，我们派出一名情报干部，打进了沈阳蒋军东北剿总司令部第二处。他临行前曾提出，准许他向敌人谎报他在哈尔滨建立了一个特务小组，还架有一部电台，以便取得敌人信任，进一步深入核心，获取敌人更高的机密。我们同意了他的建议。随即

编造了一个假特务小组名单，将东北局社会部的电台伪报作他的电台，并在他走后编了几次假情报发去。敌人果然中计了。不久，他就被提升为敌人二处的科长。我和王继同志研究后，决定通过这个途径，利用我们的电台，向敌人发假情报，配合我军在辽沈前线的作战。

假情报由治安处干部姚良同志编写，经前线作战指挥部领导同志同意后，分别适时地发了出去。

在我军攻打锦州时，我们发出假情报说：“共军有两个纵队已向冀东开去。”目的是牵制关内蒋军的北援，便于我们拿下锦州。我军回师进攻沈阳，我们又发出假情报说：“共军有大量骑兵向营口开去。”目的是阻止蒋军从海路逃跑。这两份情报，在迷惑牵制蒋军方面，在我军攻锦打援方面，都起了一定作用。

我们还应我军参谋长伍修权同志的要求，将我军参谋部编写的假情报，利用已被我逆用的哈市蒋特二五七组的电台，向敌方发了出去。情报说，我军有四个师，正在白城子至四平 and 吉林至沈阳两线上向沈阳移动。地面上也由部队相应地佯做进攻沈阳的姿态。目的是诱使敌人作出我军先打沈阳后打锦州的错误判断，掩护我军真实的军事行动和进攻方向。蒋介石认为这份情报“很有价值”，立即传令嘉奖，将二五七组组长提为上校，应诺奖给黄金二十条。

与这同时，我们又派乔庄同志带干部到彰武一线，依靠当地党

组织，发动沿线地方群众和内部人员，全面控制敌人，控制铁路电话专线，严密封锁了我军行动的消息。当蒋军忙于沈阳防务的时候，我军已经悄然如期开进锦州地区，战斗很快打响了。

当时号称蒋军最强主力的廖耀湘第九兵团，驻守在沈阳地区。他敢不敢伸头援锦？何时出兵援锦？这是我军在打援方面亟需了解的一个关键性问题。我们原先知道，他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对蒋介石的援锦命令，踌躇再三，逡巡不前。后来，迫于蒋介石的一再严令，才终于倾巢出动了。我们及时从打入蒋军剿总司令部三处的徐文彬同志那里，获得了这个情报，立即由接敌前沿区开原情报站站长程光烈同志送往前线作战指挥部。我军得以迅速调整了兵力，将他的兵团阻止在黑山、大虎山一线。攻克锦州后，我军又回师围歼，一举消灭了这个蒋介石倚为王牌的嫡系兵团。由于这份情报送得及时，受到了罗荣桓同志的表扬。

对于配合我军收复沈阳，我们在辽沈战役之前，就积极地作了部署。当时，吕正操、高崇民、于克等同志，都向我们推荐了一批同蒋军上层人物有历史交缘的情报关系。经过谈话和考察，我们认为，他们在政治上可靠，有的还是共产党员，又具备很好的打入条件，是理想的派遣人选。于是由邹大鹏、陈钟同志具体交给策反、情报任务，逐个将他们派进沈阳。加上我们在沈阳原有的情报人员，力量已经分别插进了敌人内部。什么东北剿总司令部、空军司令部、绥靖第二总队，什么

五十三军、沈阳守备第二总队、装甲兵团，等等，都有了我们的人：连军统大特务头子王化一的家里，都住进我们的情报人员了。

那时，蒋军上层分子正在政治上处于矛盾状态中。他们感到大势不妙，想拉上我方关系，寻求个人出路；但因蒋介石这棵大树毕竟未倒，又有强大的美帝国主义支持，所以还想最后看个分晓，再决定自己的取舍。这就使我们的情报、策反工作，不能不有一个耐心争取和积极等待的过程。一切取决于战局。我们必须善于抓住火候，相机策动。

情报人员李述简争取蒋五十三军副军长赵国屏，就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例证。他们是私谊深厚的旧日同学，但当李述简走进赵国屏客厅的时候，见着的却是一付冷冰冰的面孔。赵国屏虎着脸说：

“你敢莫是为共产党做说客的吗？”

“做说客也罢，不做说客也罢。我是在人民解放军大军压境的时候，特意来拉你一把的。”李述简单刀直入地做了回答。

“事情还未到如此严重地步。你我同学久别重逢，应当只谈私谊，不谈政治。”

“不谈政治？政治却要逼你来谈！”

“难道你就不怕军法无情吗？”

“那就请你把我抓起来就功好了。”

“言重，言重，我赵某还不致如此卑劣。今后，就请你安安静静住在我家好了。”

这段对话，充分暴露了蒋军上层分子进退两难的神态，他们非到路末途穷之日，是不会下破釜沉舟之决心的。而这却正是我们鼓起信心、深入工作的好条件。

随着战局的明朗化，赵国屏对李述简的态度，也由冷转热，由消极变积极。经过李述简的说服争取，最后他终于愿意说服部下放下武器，为解放沈阳立功出力了。这种情形，其他住进蒋军上层分子家里的情报人员，大抵也都遇到过。由于有个战局明堂堂地摆在那里，他们都只得按照我们的指引作出了自己的最后抉择。总之，火种已经播好，只等待机燃发了。

为了全面地调动沈阳的情报力量，我们又在辽沈战役前夕，进一步向沈阳情报组织下达了三项紧急指示：

一、积极策动敌军起义或放下武器，相机配合我军解放沈阳；
二、组织地下关系和可靠群众，保护工厂、仓库、铁路、机关和所有档案、物资，防止破坏；

三、打入敌人的内部人员，继续埋伏，不得暴露，以待我军入城后，配合进行除奸肃特工作。

三项指示传进沈阳，地下人员马上行动起来，在敌人防线内部开辟了一个无声的战场，向敌人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有关敌人的情报，则源源不断地输进了哈尔滨。

那时，蒋军为了保密，先是每两个月后是每一个月改变一次部